

中國佛教文化史

第五冊

孫昌武 著

中華書局

中国佛教文化史

第五册

孙昌武 著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佛教文化史/孙昌武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0.4
ISBN 978-7-101-06701-9

I. 中… II. 孙… III. 佛教史-中国 IV. B9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2866 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中国佛教文化史(全五册) |
| 著 者 | 孙昌武 |
| 责任编辑 | 罗华彤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 |
| 版 次 |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 179 插页 20 字数 1800 千字 |
| 印 数 | 1—3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06701-9 |
| 定 价 | 380.00 元 |
-

第十三章

大藏经的编辑与刊刻

一

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伟大业绩是《大藏经》的编辑和刊刻。佛教在中土传播，扩展影响，特别是作用于思想、文化各领域，很大程度上依赖佛典的传布。经藏的结集、收藏以及目录的编撰，对于佛典的流通和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编辑《大藏经》作为中国佛教典籍的总结性工作，对于弘扬佛法，对于积累、总结、保存佛教文献，对于佛教的教学与研究均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。《大藏经》的刊刻又是一个组织严密、规模巨大的工程，相关工作与刻板、印刷等工艺技术的普及和发展、与大规模图书印制、流通、贩卖等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，因而在文化史和经济史上亦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。直到如今，这一伟大业绩仍沾丐佛教自身和学术界的广泛领域。

经藏是“三宝”中“法宝”的物质形态，而供养“三宝”则是信仰实践的重要方式。在南北朝时期，抄写、施舍、读诵、顶礼经典已在教内、外形成风气。关于写经，关于佛教经录的编撰，本书前面相关章节已有介绍。由佛典收藏、编制经录自然发展为结集经藏。随着印刷术普及，印制经典代替抄写成为可能。这些又都得到宗教自身和技术、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保证。编撰、刻印《大藏经》这一总结性的工作也就因应形势提上日程了。

应当特别提及的是，印刷术的发明乃是古代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，而印刷术的发展与佛教的推动作用有重要关联。上世纪考古发现的早期印品实物基本都是佛教的。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佛塔内发现雕版印制的《无垢净光陀罗尼经》，其中使用了武则天朝所制新字，学术界一般认定刊刻于长安二年(702)。上世纪吐鲁番、西安、成都等处都曾发现初、盛唐时期印品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现均为佛经印品。这可以证明发明伊始的印刷技术即已用于印制佛经。印制佛教经典无疑是推动印刷术形成和发展的一大动力。

汉文《大藏经》的编纂和刊刻乃是外来翻译佛典、中土佛教撰述和中外有关佛教各种典籍长期流传、搜集、编辑、整理的总结性成果。作为大规模丛书，汉文《大藏经》具有鲜明特点：它搜罗十分广泛、全面，典籍数量众多，是古代最为庞大的大型丛书；编撰过程中作了必要的选择，是在对经典文本的不同、真伪等仔细考定后决定入藏的；整个丛书按一定的原则整理出一个系统，这个系统体现了编纂者对于全部佛法的认识和理解，又给使用者提供方便的检索线索；而相当重要的是，在教内外普遍收藏、编撰《大藏经》的情况下，由朝廷编印、刊行作为标准文本的《大藏经》，更有统一学术规范的意义，等等。这样，汉文《大藏经》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中国佛教兼容并蓄、博大精深、弘通开放的特征，又具有高度学术水准，具体显示了佛教“中国化”的历史进程及其伟大成就。

僧祐《出三藏记集·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》的《经藏正斋集》里著录有《定林上寺建般若台大云邑造经藏记》、《定林上寺太尉临川王(萧宏)造镇经藏记》、《建初寺立般若台经藏记》等文字^①，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寺院建设经藏的盛况。据《历代三宝记》记载，梁武帝天监十四年(515)于华林园总集释氏经典，又有沙门僧绍编定《众经目录》四卷，三年后经宝唱改定，计得经典

^① 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一二，第488-489页。

1433部3741卷。这一记述表明当时目录的编定是与经籍结集同时进行的。北方大约在同一时期，北魏孝武帝太昌元年(532)至永熙三年(534)整理皇家经籍，命舍人李廓编撰《魏世众经目录》，计得经籍427部2053卷。魏收作《齐三部一切经愿文》，其中说到“皇家统天，尊道崇法……复诏司存，有事缙素，精诚逾于皮骨，句偈尽于龙宫。金口所宣，总勒缮写，各有三部，合若干卷”^①。北周的王褒有《周经藏愿文》，也是为“奉造一切经藏”^②而作。这样，随着佛教发展，传播经典繁多，教内外、公私都在热心加以搜集、整理、保藏；而出于弘法目的，这些辑录起来的经籍又要广泛缮写、流通。这一时期经录的编撰也正反映辑录经典的成果，见于著录的，梁代有五种(一存四佚)，北魏、北齐三种(全佚)，隋代五种(三存二佚)。其中包括《出三藏记集》和《历代三宝记》这样具有重大价值的、创造性的著作^③。不过虽然这些经录的编辑大体应当有相应的藏书为依据，但从总体情况看，这一阶段的经藏尚没有形成统一规范，因而这只能说是《大藏经》的草创时期。

《大藏经》本来称为《经藏》、《一切经》，是经、律、论“三藏”的总集。“一切经”的名称始用于南北朝，“大藏经”一语出于隋代。灌顶曾有记载：“大师所造有为功德，造寺三十六所，《大藏经》十五藏。”^④这里所说当然还不是后来具有严格规范的“大藏经”。正规“大藏经”体例的确定是从编撰《开元释教录》开创的。

《开元录》的编定标志着从一般经录到汉文佛教大藏经目录编撰工作的完成，也为真正意义的、统一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的编刊确立起标准。《开元录》所确立的汉文大藏经的基本特征是：收录三藏经典按严格体系加以分类，从而确定所收录的每一部著作在这一系统中的位置，这实际也表明了

① 《广弘明集》卷二二，《大正藏》第52卷第257页上。

② 同上第257页中。

③ 参阅童玮《汉文大藏经简述》，《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》卷首，中华书局，1997年。

④ 《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卷第197页下。

对于每一部经典的性质、意义、价值的认识；整部经藏具有固定的结构，这种结构是总结历代经录的编辑经验制定的，基本反映了当时对于佛教典籍的历史与现状所作研究的最高水平；收录经典力求完备，即收录当时存在的、被认为有价值的全部佛教典籍；所收录的每一部入藏经典都经过认真考订、研判，不收录所谓“疑伪经”；后出新增典籍往往由朝廷敕命入藏，这也是当时佛教御用性格的一种反映。这些作为编辑佛教大型丛书的标准，就当时环境说，是体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的。《大藏经》从而成为中国典籍中规模最大、编制体系完备、制作规范严整的大丛书。第一部刻本《大藏经》出现在宋初，由朝廷主持刊刻，成为一种权威版本。这部大丛书依靠历朝公、私各方努力，特别是得到宗教力量的护持，不断地营造，形成规模宏伟的从编辑、研究到雕造、印刷、发行的文化事业。历代刊印《大藏经》除了传播和保存佛教典籍、保证佛法存续和发展的直接意义之外，更对于相关众多经济、文化部门造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。

《开元释教录》的编撰有现成的《大藏经》为依据。据敦煌文书中的藏经目录，当地寺院所拥有的经典是按《大唐内典录》或《开元释教录》收藏的。这是唐代边地的情况，可见写本《大藏经》唐时已经相当广泛地流通。历史上第一部雕版《大藏经》是北宋初年朝命于益州（今四川成都）刊刻的官版《大藏经》，俗称《开宝藏》或“蜀版大藏经”。该藏依据《开元释教录·入藏录》收录经典 1076 部 5048 卷，刻版十三万块，自开宝四年（971）历时十二年方始完成，后来在太平兴国寺内的印经院印制。此后公、私《大藏经》刻板均以这一部为基准，收录增减有限^①。关于《开宝藏》的价值与意义，李富华、何梅说：

① 接近人研究，历代刊刻的《大藏经》可以分为南、北、中三个系统，三个系统的《大藏经》虽然都以《开元录》所收为基础，但典籍数目、版式有所不同，而各系统间则有继承规律可寻。参阅李际宁《中国版本·佛经版本》第 53—57 页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。

《开宝藏》是中国的第一部刻本大藏经，开中国刻本大藏经之先河。它的问世无疑是中国刻藏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件。中国佛教典籍的传播从此有了一个可以成批生产的规模化的定本；而中国佛教大藏经的雕造也因为有了《开宝藏》这个标本而一发不可止，至明清时代，历代延续不断，近二十种规模宏大的大藏经版本，形成了中国佛教史及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丽的景观。因此，学术界如何评价《开宝藏》的历史功绩都不为过。^①

从宋初雕印《开宝藏》至清代，据文献记载，官、私所刻经版二十余副。不过早期经版和刊本现已遗存很少或全无，个别印本亦多难以确认真伪。据童玮《汉文大藏经简述》、李富华、何梅撰《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》等今人著述，《大藏经》可考见者有以下版本：

《开宝藏》：北宋官版，完成于北宋天平兴国八年(983)，后续有增补，存残卷；

《契丹藏》(《辽藏》)：辽官版，完成于辽清宁九年(1063)，存残卷^②；《房山石经》保存了部分契丹藏内容；

《崇宁藏》(《东禅寺版大藏经》)：北宋私版，完成于北宋崇宁二年(1103)，国内存(残)，日本存残卷；

《毗卢藏》(《开元寺版大藏经》)：北宋—南宋私版，完成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(1151)，存残卷，日本存(残)；

《(思溪)圆觉藏》：北宋—南宋私版，基本完成于南宋绍兴二年(1132)，国内存残卷；

① 《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》第90页，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3年。

② 1987年在河北丰润县天宫寺发现一批约十种小字本《契丹藏》，据推测是不同于大字本的另一系统版本。参阅李际宁《中国版本·佛教版本》第93-99页。

《(思溪)资福藏》:南宋私版,完成于南宋淳熙二年(1175)^①,国内存(残),日本存;

《磧砂藏》:南宋一元私版,完成于元至治二年(1322),存^②,有民国时期影印本;

《赵城藏》(《金藏》):金私版,完成于金大定十三年(1173),存,新编《中华大藏经》作为主要底本;

《普宁藏》:元私版,完成于元至元二十七年(1299),存;

《元官版大藏经》:存残卷;

《洪武南藏》:明官版,完成于明洪武三十一年(1398),存;

《永乐南藏》:明官版,完成于明永乐十七年(1419),存;

《永乐北藏》:明官版,完成于明正统五年(1440),存;

《万历藏》:明—清私版,完成于清顺治十四年(1589),存;

《嘉兴藏》(《径山藏》):明—清私版,完成于清康熙十五年(1676),存;

《清藏》(《龙藏》):清官版,完成于清乾隆三年(1738),存;

《频伽藏》:私版,清末民初。这部藏经是根据下面提到的日本《缩刷藏》加以校补翻印的。

另有几种《大藏经》情况较为特殊:一是《弘法藏》,即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》的经本,没有实物留存;《元代铜版大藏经》,元英宗曾下诏雕印,但实际是否完成,情形不明;另一部是胡适提出来的《天龙山藏经》^③,虽然已经发现一些残本,但整体结构还不清楚;第四种是《武林藏》,虽发现有印本,

① 关于《圆觉藏》和《资福藏》是否为同一部藏经,学界有不同意见。李际宁认为“《思溪资福藏》应该是在《思溪圆觉藏》基础上补刊经版而成”。《中国版本·佛经版本》第86页。

② 今存《磧砂藏》有残毁;以下注“存”的几部早期《大藏经》情况略同。

③ 1959年胡适《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思德东方书库藏的〈磧砂藏经〉原本》说到该书所藏“配补的明本之中,还有建文元年己卯刻的《天龙山藏经》”,《胡适学术论集·中国佛学史》第553页。

但学界或以为是《碇砂藏》或《洪武南藏》为底本的私刻藏经^①。

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刊刻《大藏经》，虽然内容变动有限，但并不是简单地复刻。由于刊刻时期不同，地区不同，所收经典并不完全相同，同一经典也有异文。特别是早期几种《大藏经》，包括《高丽藏》，差异更为显著。研究不同藏经刊刻系统和流传情形，对于认识佛教的历史发展，乃至了解古代书籍制度、雕版工艺以及造纸、印刷等技术水平都大有帮助，这已成为一种专门学问。

历朝官、私不断地雕造规模庞大的《大藏经》，除了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，还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值得特别重视：一是作为规模宏伟的文化事业，反映了文化、学术发展上的需求；另一方面，历代朝廷主持或支持这一事业，除了表示对于佛教的护持，也有张扬盛世、粉饰太平的作用。《大藏经》也确实是文化、经济、技术等多方面水平和实力的体现。

二

宋初《开宝藏》雕造完成后，即把十三万块经版运到京城开封府，收藏在太平兴国寺，并建立专门的印经院负责印制、流通事宜。经过近百年，到熙宁四年(1071)印经院废止，经版交圣寿禅院管理^②。当时《大藏经》的流传除私人出资请经印制，流通途径主要是朝廷颁赐。《崇宁藏》刻成后，礼部员外郎、《大藏经》都劝首陈旸的奏章中有云：

① 参阅童玮《汉文大藏经简述》，《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》卷首；程千帆、徐有富《校讎光义·典藏篇》第二章《典藏单位》第四节《寺观藏书》，第148-160页；《校讎广义·版本篇》第四章《雕印本的品类》第一节《按时代区分》，第113-152页，齐鲁书社，1998年。

② 这第一版大藏经在中土久佚，现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等五个单位存九卷，日本、美国三个单位存三卷，另自上世纪以来西域考古发现若干残片。

赐窈见朝廷近降指挥，天宁节天下州军各许建寺，以崇宁为额，仍候了日，赐经一藏。^①

后来历代朝廷颁赐《大藏经》形成制度。元世祖忽必烈“每一岁中，行布施度僧，读《大藏经》……帝命诸山师德，校补弘法寺久远藏经，鼎新严饰，以传无穷。帝印《大藏》三十六藏，遣使分赐归化外邦”^②。元代以下诸帝亦多施印《藏经》，颁散天下寺院。又佛慧圆鉴雪堂禅师于元成宗元贞二年(1296)购得二十藏，施舍给郑州一带佛寺^③，则是僧人出资购买，再施舍给其它寺院的。这种由个人施印也是后来流通的一种办法。明代以后商品经济逐渐发达，印刷技术也相应提高，南、北二《藏》和清代《龙藏》请印更简易，流通也更广。即使是山间水涯的偏僻寺院，也多收藏有完整的《大藏经》。由于寺院藏品往往能够得到更珍重的保护，包括《大藏经》在内的许多典籍在寺院里得以妥善保存，又给阅读、利用提供了便利。例如李贽罢官姚安府，就曾到僻处云南边远地区的鸡足山阅读《大藏经》，可见当时藏经广布情形的一斑。

一部《大藏经》的雕造要消耗大量物力、人力、时间。由朝廷操持其事，往往能够显示国家对于佛教的支持；而私人营造则更体现了信仰的热忱。例如《崇宁藏》是王氏一族所造。现存王永从发愿题记中写道：

大宋国两浙路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村居住左武大夫、密州观察使致仕王永从同妻恭人严氏、弟中翊郎永锡、妻顾氏、侄武功郎仲允、妻卜氏、从义郎仲彦、妻陈氏、男迪功郎仲元、妻莫氏、保义郎仲和、妻吕氏与家眷等，恭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万岁，利乐法界一切有情，谨发诚

① 《崇宁藏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经首牒文，转引《中国版本·佛经版本》第71-72页。

② 《释氏稽古略续集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49卷第908页上-中。

③ 参阅《郑州荥阳县洞林大觉禅寺藏经记》，《金石粹编补正》卷四。

心，捐舍家财，开镂《大藏经》版总五百五十函，永远印造流通。^①

这是以一家两代人的财力雕镂一副经版。《磧砂藏》里《大宝积经》卷二十九末尾鲍善恢题跋里有佚存的《赵沔碑》，其中说刊镂经版“协力助缘刘法善等五十余人，亦皆断臂、燃臂、燃指、刳眼、割肝，至有舍家产、鬻男女者，助修经版胜事，始终三十年之久，方得成就”^②。这也是反映营造者虔诚心态的实例。

这庞大的经典群的刻印、收藏和传播对于佛教和佛教文化的意义自不待言，在一般文化、科技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。

首先，《大藏经》的编辑和刻印，为广大信众，也为全社会提供一套完整、规范的佛教典籍大丛书。它作为“三宝”之一的法宝的集合，首先是供信徒供养、读诵和研习的宗教宣传品，但也给有关佛教学术与一般文化、学术的传播、教学与研究提供了相当完备的资料。特别由于汉文《大藏经》广泛、全面地收录中、外不同部派、学派、宗派的经、律、论“三藏”和相关著述，整部藏经又是按一定教理系统加以编排的，更给阅读、利用者提供了极大便利。而其所体现的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，又给人以启示和教益。

其次扩展开来说，《大藏经》包含众多学术领域的内容，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。它作为庞大的典籍群，又给所涉及广泛文化、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。佛教乃是与儒家、道家和道教并列的古代文化发展的支柱之一，研究古代文化，特别是思想、哲学，佛教乃是基本内容，离不开《大藏经》；《大藏经》里涉及伦理学、史学、美学、语言学、文学、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内容丰富多彩，许多是在一般文献中难以见到的。《大藏经》里更有两个领域的内容特别值得珍贵：一是古代南亚、中亚历史、地理和中、外文

① 见日本京都南禅寺所藏《崇宁藏·长阿含经》卷二二，转引《中国版本·佛经版本》第80页。

② 转引《中国版本·佛经版本》第110页。

化交流的丰富知识，一般文献里相关材料留存稀少，《大藏经》里提供的资料是无可替代的；再是古代佛教文献里包含有大量涉及道教和其它宗教（包括民间宗教）的内容，乃是有关古代宗教史的宝贵材料，也赖《大藏经》相当集中地保存。因此，从事有关中国的几乎是所有的学术研究，《大藏经》都是不可或缺的。

第三，《大藏经》的编辑与目录学有直接关系。图籍的搜集、整理、保存是一种专门的典藏学术，即现代的图书馆学。前面说过，佛教经录的编撰与《大藏经》的编辑是同时进行的一项工程的两部分。因此《大藏经》这一空前庞大丛书的编撰、保存、流通又极大地推动了目录学和典藏学术的进步，为大型丛书、类书、工具书的编撰积累了经验，提供了借鉴。直接的影响是《道藏》的编辑；还有在《大藏经》的基础上编辑不同类型的佛教丛书（如后来智旭编《阅藏知津》，直到近年编撰《中华大藏经》）；以及使用《大藏经》编制各种索引，等等，这些都推动了文化、学术事业的发展。

第四，宋代雕造《大藏经》，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都体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准。雕造一部《大藏经》不仅是规模巨大的雕版、印刷工程，还需要得到造纸、印刷等广泛领域的技术保证，以及书籍装帧艺术等方面的支持。而如此规模巨大的包括搜集、考订、整理典籍等工作的学术活动，从印制到发行、运输、贩卖等多方面的经济活动，从组织到实施都需要投入大量人力（从佛教学术专门家到各种技术工匠等）、物力（包括大量资金、营造场所和木版、纸张、油墨等印刷材料以及运输、贩卖手段等），要有相当庞大的经济体系来支撑，又要有操作、经营、管理的人才和经验。这样，完成这样规模巨大的事业，对于相关经济、技术各领域的发展必然会给予有力推动。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的成就，集中地在《大藏经》的印制中体现出来。在古代大型集体经济活动中，《大藏经》的刊刻、印制和流通成为典范，从而对于整个手工业、商业的发展，对于早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。具体情况是需要认真考察、研究的。

第五,西夏、元代和清代曾译印西夏、蒙、藏、满文《大藏经》,直接促进了佛教在这些民族聚居地区的传播;同时作为文化活动,更促进了汉族与这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。其中藏传佛教的藏文大藏经《甘珠尔》和《丹珠尔》是藏译佛典的总集,内容不同于汉文《大藏经》,另成一个系统,具有独立的文化和学术价值。早在北宋时期,朝廷就曾把《开宝藏》颁赐给日本、高丽、西夏、契丹和越南。后来汉文《大藏经》广泛传布在这些邻近国家。日本、三韩、越南佛教一直以汉文佛经为典据。这些国家的佛教信徒诵读的是汉文藏经。中国早期雕印的几种《大藏经》在本土仅存少数残卷,但在日本却多保存有全藏,可见这些典籍在古代日本流传和受到敬重的情况。《大藏经》颁赐和流传邻近诸国,首先有力地推进了汉传佛教的发展,进而促进了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,对于建设所谓“汉字文化圈”起了相当巨大的推动作用。三韩和日本又都曾雕造汉文《大藏经》。高丽在显宗二年(1011)即《开宝藏》刻成的太平兴国八年(983)的仅十八年后就开始加以复刻,这是在国外雕造的第一部汉文《大藏经》。这部藏经在日本存有残卷。此后从文宗朝到宣宗朝,又参照新传入的《契丹藏》续雕《大藏经》。高宗十九年(1232)蒙古人入侵,两副经版均为兵焚所毁。高宗二十三年(1236)第三次雕造,经过十五年至高宗三十八年完成,以经版八万块又称《八万大藏经》,经版如今仍完整地保存在庆尚南道伽耶山海印寺,印本俗称《高丽藏》。这部藏经保存了早期《开宝藏》和《契丹藏》的面貌,又曾经过仔细校订,是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经本。日本奈良和平安时代(710—1191)是汉传佛教输入的全盛期,大量汉文经典输入。到镰仓(1192—1333)和南北朝时期(1334—1392),在幕府支持之下,数度根据传入的《大藏经》经营雕造,其中有今存所谓《弘安藏》,雕造于弘安十年(1287)至正安四年(1302),存有少数印本,是否完成全藏不明。到江户时期的庆长十九年(1614)伊势高日山常明寺僧人宗存模仿《高丽藏》刊刻藏经,历时十余年,没有完成全藏,今存印本近三百卷。日本所刊刻全藏第一种是雕造于宽永十四年(1637)至庆安元年(1648)的木活字本,以主事者为

僧人天海，称《天海藏》，又称《宽永寺藏》、《东叡山藏》、《倭藏》；第二种是雕造于宽文九年(1669)至延宝六年(1678，后续有订补)的《黄檗藏》，以主持者为黄蘗宗僧人铁眼道光，又称《铁眼藏》。近代日本又编印了《大日本校订缩刷大藏经》(1880，简称《缩刷藏》)、《大日本校订训点大藏经》(1902—1905，简称《卍字藏》)和《卍续藏经》(1905—1912)、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(1924—1934)等。后一种简称《大正藏》。近代出版了排印的《弘教藏》、《卍字藏》、《卍字续藏》和《大正藏》。其中《大正藏》分为《正藏》、《续藏》、《图像》和《总目录》四部分，共收录经典 3493 部 13520 卷，在新编《中华大藏经》以前是所收典籍最多的藏经。它编排别具一格，便于使用，自昭和九年(1934)印制完成，即成为国际学术界通用的版本。《卍续藏》多收唐宋以后其它藏经未收典籍。高丽和日本雕造、排印汉文《大藏经》，是中国和这些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，也是中国对这些国家文化的贡献，以实物记录下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。

三

讲《大藏经》，应当特别表扬雕凿《房山石经》的巨大工程。这也是历史上遗留的规模宏伟、价值巨大的文化珍品。

磨石雕刻本来是中土流通经籍的传统方式之一。最早的实物有一般认为是战国秦刻《石鼓文》。汉、魏以来儒家典籍屡次上石，是传播经典、统一经本的重要手段。佛经石刻，有磨崖和碑刻两大类，兴盛于南北朝后期^①。如山东泰山经石峪所刻《金刚经》、徂徕山佛岩所刻《大般若经》、响堂山所刻《维摩诘经》、《弥勒成佛经》四部经典，是众多北齐时期刻经中的代表作品。这些刻经上石，与末法思想流行有直接关系。北齐那连提黎耶舍于天统二年

^① 参阅叶昌炽撰、柯昌泗评《语石 语石异同评》。

(566)译出集中阐扬末法思想的《大集经月藏分》十卷；八年之后(574)即发生周武灭佛，更推动末法思想的盛行，从而使经典上石摹刻的活动广泛流行开来。在近年佛教摩崖造像的考古调查中，又陆续发现不少刻经，分布在今河北、山东、山西广泛地域。例如河北涉县中皇山北齐刻经，包括《十地经》、《思益梵天所问经》、《佛说孟兰盆经》、《妙法莲华经》等，总计经文十三万余字；山东平阴县发现《文殊般若波罗蜜经》刻石；河北曲阳县羊平村隋代造摩崖造像经龕内刻有《佛垂般涅槃略说教戒经》、《妙法莲华经》的《观世音普门品》等^①。而规模最大、数量最多、工程延续时间最为长久的是今北京房山区石经山《房山石经》的雕造。据近年实地考察统计，石经山九个洞内和云居寺南塔前地穴中分别藏有石刻经版 15061 块(其中完好的经石 14621 块，洞外有重要碑铭 82 通)，镌刻佛典一千余种、三千五百余卷，另外还有六千八百余则题记。作为世代佛教信徒和刻经匠人的壮举，其工程浩大惊人，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。1987 年中国佛教图书文化馆影印出版了《房山石经》五十六册。

房山石经的发踪者是隋唐之际的沙门静琬(?—639)。他继承师傅慧思遗愿，在今北京市房山区云居山开始刻造石经。当时的目的不是为了拓印流传，而是鉴于魏武、周武两次毁佛，经像被焚毁，僧徒中普遍存在“末法”时期来临、佛法将被毁灭的危机感，因此企图采用传统刻石办法来保存经典。自静琬于隋大业末年即七世纪初开始刻石，到贞观年间刻成《大涅槃经》，继而信徒前赴后继继续营造，迎来唐初刻经的兴盛时期，直至唐末中绝。到辽代圣宗时地方官韩绍芳奏请续刻，得到朝廷支持，遂募集资财，雕造事业又大规模地恢复。现存石经中《涅槃》、《华严》、《般若》、《宝积》四大部就是

① 赵超《古代石刻》第 206 页，文物出版社，2001 年。详见马忠理等《涉县中皇山北齐佛教摩崖刻经调查》，《文物》1995 年第 5 期；乔修昱、青柏《平阴发现北朝摩崖刻经》，《中国文物报》1995 年 7 月 6 日；李建华《河北曲阳八会寺隋代刻经龕》，《文物》1995 年第 5 期。

这一时期刻成的。金代又陆续补刻。辽、金从而成为石经雕刻的又一个兴盛时期。现存六千八百余则施刻人题记中，有明确纪年的占四分之一，它们反映了刻经的具体状况。这些题记大体可分为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碑刻和一般题记，从唐代至民国，共计一百一十余条；另一部分是诸经题记，唐代的二百余条，辽、金的达六千余条，元、明、清的百余条^①。辽、金时代最多，正反映当时刻经的盛况。元代除对少数经版进行过修理，工作基本停顿。后来又断断续续地进行，直至17世纪才完全停止。这项巨大的工程前后持续千余年，参与工作的僧人、居士、工匠不计其数。在漫长的刻经过程中，耗费人力、物力无算，众多僧俗信徒、工匠付出大量资财和劳力；历代许多皇室、贵族、官僚也给予大量捐赠，加以支持。例如唐玄宗的八妹金仙长公主，就曾出资施捐，奏请玄宗下赐大唐新旧译经四千余卷，作为刻经底本。辽代本是契丹族建立的割据政权，统治者大力尊崇佛教，许多贵族、官吏施助刻经，也反映了这一民族接受、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总趋势。

全部《房山石经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《大藏经》。因为如此长时期、经众工之手的刻石不可能严格按照一定的规划进行，更不可能依照《大藏经》编目刻制。它基本是依照不同时期施主发愿随宜雕造的。因此流行的经典，特别是短小的《金刚经》、《心经》之类被不断重复雕刻。又如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题记就有九百余条，反映了历代对于这部经典的重视。所以一万五千余石上实际所镌刻经典按部数统计只有一千部左右，有些经典还只刻成全文的一部分。但是《房山石经》却具有其它各种《大藏经》所不具备的价值和作用。一方面，这批石经反映了雕刻当年那些经典的面貌，例如唐刻的许多经典基本反映唐代宫廷写本的面貌，辽、金刻石大多以《契丹藏》为底本，而《契丹藏》已基本亡佚。这样，石经在考察经典流通面貌，在校刊上就有重大价值。另一方面，石经里包含88部、174卷各种《大藏经》未收佛典，还有几部道教

^① 这里和下面的统计数字均据徐自强《房山石经题记汇编·前言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7年。